



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与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朱乃诚



王景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本文分析了近90年来160多种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创办与发展情况,提出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与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一样,经历了初创与早期发展、全面发展、复苏时期、成熟发展等四个阶段。现在的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格局,是1979年以来形成的。目前主要刊物的栏目形式有所变化,但研究论文与田野资料并重的办刊方针总体上没有变化。近10年来一些刊物新增加了文化遗产保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的内容,这应是中国考古学在21世纪发展的三项新的内容。

关键词:考古学,文物,博物馆,期刊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160 periodicals o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last 90 years.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periodicals experienced the same process as tha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t composes four phases including initial and early phase, flourished phase, resurgence phase, and mature phase. The present periodical pattern has been established since 1979. Though some headings of the columns have been varied, the research papers and field reports as the first priority is unchanged. Some magazines offe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scientific archaeology, and public archaeology, which are three new column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archaeology,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periodical

中国考古学经过近90年的发展,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成为涵盖面宽广、分支领域众多的一门成熟的学科;是解决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夏商周及其以前的历史、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文化史等重大课题,探索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科中,借助应用自然科学手段,使本学科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

反映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是无数的考古学发掘与研究成果,以及与考古学研究有关系的其他各学科研究领域的各种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有的以专著的形式公布,有的则以学术论文的形式通过有关的期刊公布。其中80%以上是在考古文物类期刊上公布的。

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是基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要求而创办并发展的。近9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史,尽管有几个年份处于停滞发展的状况,但从宏观上看,大致可以区分为几个大的发展时期。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大致也经历着同样的发展状态。所以,分析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状况,可以从一个角度窥见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一.中国考古学初创与早期发展 时期的考古文物类期刊

1928年,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设立了专门的考古研究工作组,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而中国考古学的专门期刊,则通常以1936年刊行的《田野考古报告》(即《考古学报》的前身刊物)作

为中国最早的考古期刊的代表。然而,《田野考古报告》是在《安阳发掘报告》基础上形成的。其形成的背景是:中国的田野考古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不局限于最初开展的殷墟发掘;刊发田野考古研究资料,原先的《安阳发掘报告》一名实际上是不能涵盖了。于是1936年提出将《安阳发掘报告》改名为《田野考古报告》,但编辑人员大部分是原班成员,编辑形式与方针(精神上的格律)仍然是承袭《安阳发掘报告》。所以,严格地讲,中国的第一种考古期刊,应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并发掘安阳殷墟之后于1929年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算起,至今已有80年了。

《安阳发掘报告》的创刊,是中国成立专门的考古研究工作组、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结果。而由《安阳发掘报告》改名为《田野考古报告》则是中国田野考古向安阳以外地区、商代以外时段发展的结果。这一现象说明,中国考古类期刊的创刊与最初的发展与中国考古事业的开创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在1949年以前,除了专门刊载田野考古研究成果的《田野考古报告》(1947年改刊名为《中国考古学报》)外,刊载考古学、人类学或金石学,以及传世文物研究的刊物,还有1934年由北平燕京大学考古学社创办的《考古学社社刊》、1938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的《人类学集刊》,以及一些博物馆馆刊等。如1929年由北平故宫博物院创办的《故宫》、《故宫周刊》(1936年改名为《故宫旬刊》),还有1933年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创办的《西湖博物馆馆刊》,1935年由中国博物馆协会创办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6年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创办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和河南博物馆创办的《河南博物馆馆刊》,1944年由四川博物馆创办的《四川博物馆馆刊》,1945年由华西大学博物馆创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抽印丛刊》,1946年由国立沈阳博物馆创办的《沈阳博物馆专刊:历史与考古》,1946年由上海市立博物馆创办的《文物周刊》等。

二. 中国考古学全面发展时期的

考古文物类期刊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1949年秋,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科学院即开展中断12年之久的周口店遗址的发掘,1950年春又开展中断13年之久的殷墟考古发掘。中央人民政府及时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等有关文物法令,尔后各地的田野考古工作相继展开。为适应新中国考古文物工作的发展,考古文物类期刊开始走上发展的道路。

如除继续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报》(1953年第六册改为《考古学报》)外,1950年由国家文物局创办《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办《考古通讯》。《考古通讯》创办初期的方针是普及考古学知识、提高田野工作方法和室内整理方法。目的是:以便考古工作者可以互通声气、互相学习,以便提高考古工作的水平。内容方面多刊登一些各地有关发掘、清理和调查的简讯,以区别于刊登专门性研究成果和长篇报告的《考古学报》,区别于刊登和宣传有关文物工作的重要政策法规、博物馆和图书馆工作报导与经验介绍为主的《文物参考资料》。形式上是半通俗性,半学术性。

1959年《考古通讯》和《文物参考资料》这两个刊物分别改名为《考古》和《文物》,内容上更突出了学术性。《文物》基本上不再刊登图书馆方面的内容。这两个刊物的更名所反映的学术背景大致是:中国考古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中国培养的一批考古工作者加入考古研究队伍后,成果日益丰富,考古学科迅速发展。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办的与考古文物有关系的其他刊物有:1950年由南京博物院创办的《南博旬刊》、1955年由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创办的《文物工作资料》(内部资料)、195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博物馆译丛》、1958年由故宫博物院创办的《故宫博物院院刊》、旅顺博物馆创办的《旅顺博物馆通讯》、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1957年创办英文版《古脊椎动物学报》的基础上创办中文版《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年由上海博物馆创办的《国际文物、博物馆工作参考资料》,1964年由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博物馆创办的《广东文博资料》,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北后,1953年由台湾大学主办的《考古人类学刊》,1961年由(台北)历史博物馆创办的《历史文物》,1966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创办的《故宫季刊》等。

三. 1972~1978年中国考古学复苏

时期的考古文物类期刊

1972年至1978年,是中国考古学经历了一段停顿之后的复苏时期。这个复苏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将出现又一个大发展时期的前奏。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特色。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三大期刊《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因故于1966年停刊后,于1972年复刊。这是中国考古学经历了停滞发展之后开始复苏的一个标志。这之后,伴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省

区一级考古学研究队伍与成果的发展,一些省区一级的考古文物类期刊相继问世。

如1973年由云南省博物馆创办的《云南文物》,1974年由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创办的《文物工作通讯》、福建省博物馆创办的《文博动态》、湖北省博物馆创办的《湖北文博简讯》、广东省博物馆创办的《文博动态》(1978年改为《文博通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创办的《文物博物馆工作通讯》,1975年由辽宁省博物馆创办的《文物工作简讯》、江苏省文管会与南京博物院创办的《文博通讯》、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创办的《文物工作通讯》、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创办的《陕西文博简讯》,1976年由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创办的《天津文物简讯》、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创办的《文博简讯》、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办的《新疆考古资料》,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创办的《河南文博通讯》、上海博物馆创办的《文物译丛》,1978年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创办的《上海文物通讯》等。

个别地、市一级的文博单位也创办刊物,如宝鸡的《文博工作》(1973年)、扬州的《文物资料选辑》(1976年)、《汕头文物简讯》(1978年)、《咸阳文物简讯》(1978年)等。

而文物出版社于1972年出版《文物:革命文物特刊》,1976年创办《革命文物》(1981年改为《文物天地》),1977年出版《文物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1972年创办了《化石》,1973年恢复所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中国历史博物馆于1978年创办《历史与文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则于1978年创办《考古学参考资料》,以介绍与中国考古学研究有关的国外考古学研究成果。

1972年至1978年期间创办的这些刊物,有的是不定期刊物,有的是以书代刊,多数是内部交流刊物。但是,其作用无疑是推进了中国考古文物工作的发展,是当时的学术研究的愿望,突破禁锢之后的一种强烈的表现形式。其中的一些刊物,后来改变形式,成为至今还在发挥学术作用的正式期刊。

四.中国考古学成熟发展时期的 考古文物类期刊

1979年,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一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开始步入了她的成熟发展时期。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也开始得到了大的发展。现在的许多考古文物类期刊,除三大杂志外,大多是在1979年以来创办的。

如1979年国家文物局创办《文物通讯》,1985

年改名为《文物工作》。文物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文物集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81年创办《考古学集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1982年创办《人类学学报》,故宫博物院于1979年创办《文博参考资料》,1980年创办《紫禁城》,中国历史博物馆于1979年创办《中国历史博物馆刊》(2002年改为《中国历史文物》),中国博物馆学会(原称中国博物馆协会)于1981年创办《中国博协通讯》(1982年改为《博物馆通讯》,1986年改为《中国博物馆通讯》),1984年创办《博物馆》(1985年改名《中国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与中国钱币学会于1983年创办《中国钱币》等。

各省区的文博单位也在1979年之后创办了较正规的考古文物类期刊。

如《首都博物馆丛刊》(1982年)、《山西文物》(198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辽宁文物》(1980年)、《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3,1990年改名为《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博物馆研究》(1982年)、《黑龙江文物丛刊》(1981年)(1985年改名为《北方文物》)、《上海博物馆馆刊》(1981,后改名为《上海博物馆集刊》)、《国外自然科学与文物考古技术》(1985年)、《南京博物院集刊》(1979年)、《东南文化》(198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1979年)、《安徽文博》(1980年)、《文物研究》(1985年)、《福建文博》(1979年)、《江西历史文物》(1979年)、《农业考古》(1981年)、《中原文物》(1981年)、《江汉考古》(1980年)、《湖南考古辑刊》(1981年)、《广东文博》(1983年)、《广西文物》(1985年)、《四川文物》(1984年)、《贵州文物》(1982年)、《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5年)、《西藏文物通讯》(1981年)、《考古与文物》(1980年)、《史前研究》(1983年)、《文博》(1984年)、《敦煌研究》(1983年)、《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宁夏文物》(1986年)、《新疆考古》(1979年)、《新疆文物》(1985年)以及《故宫学术季刊》(1983年)、《故宫文物月刊》(1983年)、《台湾博物》(1982年)、《中国文物世界》(1985年)等。其中个别刊物是前一时期的刊物的更名与发展,如1975年创办的《文博通讯》于1985年更名为《东南文化》,1977年创办的《河南文博通讯》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1966年创办的《故宫季刊》于1983年更名为《故宫学术季刊》等。

这时期,一些地、市一级的文博单位创办的刊物有《包头文物资料》(1984年)、宁波市的《文物与考古》

《1979年》、《福州历史与文物》(1981年)、《新乡文博》(1980年)、《广州文博通讯》(1981年)、《桂林文物》(1980年)、《成都文物》(1983年)、《川南文博》(1985年)、《贵阳文物》(1981年)、《平凉文博》(1984年)等。

在1979年至1985年短短的六年內,创办的考古文物类期刊有五六十种。

1986年后又创办了十多种省区一级的考古文物类刊物。如《收藏家》(1993年)、《北京文博》(1995年)、《文物与考古研究》(1987年)、《天津文博》(1986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年)、《文物春秋》(1989年)、《文物季刊》(1989年)、《辽海文物》(198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89年)、《华夏考古》(1987年)、《湖南文物》(1986年)、《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88年)、《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86年)、《青海文物》(1988年)、《水下考古通讯》(1987年),以及《海岱考古》(1989年)、《环境考古研究》(1991年)、《考古学研究》(1992年)、《科技考古论丛》(1991年)等。

而在辽东、苏南、浙江等地区则集中涌现出一批地市级文博单位创办的考古文物类刊物,如《大连文物通讯》(1986,1987年改名为《大连文物》)、《金州博物馆馆刊》(1990年)、《沈阳文物》(1992年)、《泰州文博资料汇编》(1988年)、《无锡博物馆通讯》(1989,1990年改名为《无锡文博》)、《扬州文物》(1990年)、《常州文博》(1989,1990年改名为《文博之友》)、《苏州文博通讯》(1990,1992年改名为《苏州文博》)、《常熟文博》(1991年)、《江阴文博》(1999年)、《杭州考古》(1990年)、《温州文物》(1984年)、《舟山文物》(1981年)、《绍兴市考古学会会刊》(1989年)、《湖州文博》(1999年),以及《泉州文物》(1995年)、《开封文博》(1989年)、《武汉文博》(1988年)、《陇右文博》(1996年)、《玉溪文博》(1990年)、《宝鸡文博》(1991年)。还有《青年考古学家》(1988年)等。

这些期刊,有的在几年后的期刊调整中停刊了,有的根据刊载内容的变化与发展,更换了新的刊名,如《江西历史文物》于1989年更名为《江西文物》,1992年更名为《南方文物》。但基本形成了现在的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格局。所以,1979年以来的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状况,也是反映中国考古学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五.近十年来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发展的动向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趋势

近十年来,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又有了新的发

展。主要表现在创办新的期刊和一些主要刊物的栏目形式的变化等方面。

近十年来新创办的期刊有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中国文化遗产》(2004年),中华书局、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主办的《中华遗产》(2004年),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研究所(现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故宫学刊》(2004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的《上海文博论丛》(2002年),浙江省博物馆主办的《东方博物》(1997年),浙江省文物局主办的《浙江文物》(2003年),湖南省博物馆主办的《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年),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古代文明研究通讯》(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等。还有系列文集形式的刊物,如国家文物局创办的《中国重要考古发现》(1998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创办的《古代文明》(2002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创办的《边疆考古研究》(2002年)、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创办的《东方考古》(2004年)、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创办的《岭南考古研究》(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创办的《科技考古》(2005年)等。这些刊物大多是以书代刊的形式。

主要刊物的栏目形式的变化,如《文物》从1993年第7期开始、《华夏考古》从1994年第1期开始、《考古》从1996年第1期开始、《考古与文物》从1997年第1期开始、《中原文物》与《江汉考古》从1998年第1期开始,相继以考古新发现、专题研究等栏目刊载文章,但研究论文与田野考古报告二者并重的办刊方针在总体上没有改变。

从近十年来我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看,新增加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和科技考古的分量。这可能是反映了我国考古学在经历的成熟发展期的又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而从学科发展的内容看,公众考古也正在逐步兴起。尽管现在还没有《公众考古》这种刊物,但是,一些刊物中增加了公众考古的内容,有的大学也开设了公众考古的课程,举办了公众考古的学术会议,出现了论述公众考古的论文。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有《公众考古》这种新的期刊。

这些现象表明,文化遗产保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将是21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三项新的内容,

(下转第153页)

彩绘使用了三色,釉里红表现桃实熟透了的部分,釉上淡水绿彩表现桃实生果的青绿本色,釉上黑彩修饰桃实边缘轮廓和桃实的股沟。桃实个个丰腴,水分充盈,熟透的部分为釉里红色表现得维妙维肖,盖料淡水绿也敷设得极其传神,由青绿转红过渡自然,黑料的修饰毫无生硬之感,个个桃实挂在生气勃勃的枝叶间显得无比的玲珑可爱。这幅美丽画面的创作者是著名的陶瓷艺术家王锡良。

在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中,桃树是一种吉祥物,其木、枝有避邪厌胜之功能,所以自古就有年节之际“新桃换旧符”之习。同时桃实的文化形象还有祝

寿、长寿的象征意义,古代的人们还常用碧桃来制做“九重春色”造型的陈设艺术品,以代表春色永驻、春光永在的意思。杜甫曾写诗句“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古代中国人认为天有九重,“九重春色”,即大地之上、普天之下都是春光明媚,自然是寓意天下太平、欣欣向荣了。用这种图案来装饰人民大会堂的陈设桌面以庆贺十年国庆,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责任编辑:刘慧中)

(上接第155页)名,但也能偶见佳作,眼前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件20世纪80年代所刻的一路连科图竹雕笔筒(图见封底)。

此笔筒高16厘米,口外径12.7厘米,口内径10.3厘米,直口,平唇,呈圆筒式,竹质,取高浮雕技法,图案遍布整个笔筒的外壁器身,所雕刻的是一路连科图。

此笔筒的图案是以笔筒的底部作为荷塘,由满池的荷叶、莲花、一只鹭、一只螃蟹构成一路连科的画面环绕在整只笔筒的外壁上。那满池的荷叶千姿百态,有阔展开来的,也有卷边的,荷叶上的筋脉纹清晰可见,形态逼真。莲花给人以姹紫粉嫩的感觉,有的已经绽放了,有的含苞欲放。这满池的荷叶与莲花在微风的吹动下,显得迂回回转,迎让穿插,互为依偎,若即若离。一只白鹭悠然信步在莲花与荷叶之

间的水中,在一片阔展的荷叶上另有一只螃蟹正在戏耍,颇显闲趣。整幅构图均衡和谐统一,集绘画雕刻于一体。

此幅构图取材于鹭、莲花、荷叶,“鹭”与“路”同音,“莲”与“连”同音,旧时科举考试连续考中谓之“连科”。一只白鹭在有莲花、荷叶的水边谐音“一路连科”,寓意应试成功,仕途顺利。因为由古至今人们都向往着科考应试能够顺利,仕途能够一路攀升,所以此图案经常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器物上。

此笔筒的时代虽为20世纪80年代,但是在雕刻上后人继承了嘉定派先人的高浮雕技法,刀法娴熟奔放,工艺精湛细腻,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

(责任编辑:刘慧中)

(上接第108页)

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可能正经历着转型时期的三项重要标志。

当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在21世纪前期是否经历着转型期?还要经过若干年或相当长的时间的发展,才能够看得清楚。

我们热切地盼望中国考古学将迎来新一轮的大发展,也衷心地期望我国考古文物类期刊在继承传统、开拓领域、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得到进

一步的完善与发展。

注释:

李济:《编辑大旨》,《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

夏鼐:《回顾和展望——《考古》二百周年纪念》,《考古》1985年第5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